

论唐人“文章即诗歌”的文学观念

吴光兴

内容提要 “文章即诗歌”作为唐代流行的基本的文学观念，是唐代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。这一观念渊源自东晋南朝的“文笔说”、“诗笔说”理论，而大畅于唐代。随着唐人倡导的“古文（古文章）运动”在北宋取得决定性胜利，复古的理想变为现实，“文章”的“首席之座”最终让与“古文”，“文章即诗歌”的文学观念从此作古。

中国古典文学中的“文章”概念，按诸宋代、明代以来相沿成习的常识，若将“诗歌”包括在其中，那是在比较广义的角度才能成立的。通常的“诗文”成语，“诗”指诗歌、“文”指“文章”；“诗文”二字复合连文，由文人士大夫别集的两大体裁，进而亦笼统指别集（文集）本身。因而，流行的“诗文”概念当中的“文章”，一般与“诗歌”齐行韵文相对待，大体上就是杂言、成段、不入韵的文言散文的总名称。这个“文章”概念实质上是文学史上唐宋以来“古文”（古文章）的余裔，同样属于特定历史时期观念建构的产物，绝非从来如此、理所当然。对此，我们很容易习焉而不察。

回顾中国文学观念史，“诗歌”与“文章”并不总是两个互相外在的、对待的概念，反而曾经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关系。在唐代，“文章即诗歌”，即名之曰“文章”，通常首要的、主要的意指“诗歌”的称名习惯，曾经普遍流行，并且，这一称名习惯渊源有自。“文章即诗歌”的观念体现了隋唐文学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深刻联系，以及唐宋文学之间的历史隔膜，值得我们关注并研究。

一 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在唐代之流行

称名曰“文章”，语义首要的、主要的指“诗歌”，这种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用例，在唐人著作中近乎俯拾皆是。显著者如韩愈诗中的两个例

子。元和十一年（816）《调张籍》曰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，那用故谤伤。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”^①似乎同时代有人对李白、杜甫的成就发表了不恭敬的评论，韩愈起而捍卫。众所周知，“李杜”实是天宝年间成就的两位伟大诗人，“李杜文章”云云，即“李杜诗歌”也，则“文章即诗歌”。又如元和元年（806）韩愈《荐士》曰：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。勃兴得李杜，万类困陵暴。”这是为推荐诗人孟郊而作的一首诗，从“周诗三百篇”开始，历数各代文学成就，至当代止。“国朝盛文章”云云，赞美唐朝“文章”鼎盛，陈子昂开其先锋。论者早已指出：“观其论述，专在诗歌，所谓文章，即《调张籍》诗中所言‘李杜文章在’之文章，实指其诗，与其他文体无预也。”^②《荐士》诗夸唐朝“文章”，也表彰到李杜，同样是个“文章即诗歌”的例子。

不仅韩愈一家，称“诗歌”为“文章”，在唐人属约定俗成的惯例。比前揭韩愈早百年的例子，如韦述《广陵送别宋员外佐越郑舍人还京》：“朱绂临秦望，皇华赴洛桥。文章南渡越，书奏北归朝。树入江云尽，城衔海月遥。秋风将客思，川上晚萧萧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一〇八）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贬越州长史，事在景龙三年（709）^③，杜甫出生前三年，路经广陵（扬州），韦述作此诗赠之，同时亦赠北上京城郑舍人，宋之问也是本年韦述进士及第的座主。诗曰“文章南渡越，书

奏北归朝”，北上洛阳的“郑舍人”是前去职掌朝中的“公文”的，称为“书奏北归朝”，则“书奏”指代“公家之文”；而南下越州会稽郡的宋之问是当代诗人之冠冕，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本传所谓“尤善五言诗，当时无能出其右者”即“五言诗第一”之人物。当代最大的诗人前往越州称为“文章南渡越”，则“文章”指代“诗歌”。与宋之问同时交好的另一位著名诗人陈子昂的名言：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，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。”^④慨叹五百年来，“文章”中已无“汉魏风骨”，“文章”也是指诗歌而言也。证明初唐时代就有称“诗歌”为“文章”的习惯。

唐中期，如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诗曰：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”（《钱注杜诗》卷十）这是杜甫流寓秦州时的作品，当时，杜甫的好朋友李白因为在“安史之乱”之中错误地加入叛逆的永王幕府，被判流放西南夜郎。杜甫极其牵挂李白，感叹“文章憎命达”，李白诗歌写得好，可是坏运气不断，难道“文章”就是仇恨命运发达的人吗？^⑤妨碍李白运气的那个“文章”，在李白就是“诗歌”。又如杜甫《赠华阳柳少府》诗曰：“吾衰卧江汉，但愧识玕璠。文章一小技，于道未为尊。起予幸斑白，因是托子孙。”（《钱注杜诗》卷六）这是杜甫晚年客居夔州时的作品，赠给同样客居夔州的华阳柳少府。柳少府年纪方壮，又有俊才，杜甫自叹已经衰老，所以，将子孙拜托给柳氏。“文章一小技，于道未为尊”，杜甫自谦自己一生的成就仅在“文章”小技方面，其“文章”小技也是指“诗歌”。

晚唐的例子，如历代相传的韩愈《赠贾岛》七绝一首：“孟郊死葬北邙山，日月星辰顿觉闲。天恐文章浑断绝，再生贾岛在人间。”注韩集者疑其非韩愈之作^⑥，或是。然而，最早收录于韦庄《又玄集》，又说明该诗不是唐末五代以后的作品。诗曰：孟郊死后葬在洛阳的北邙山，日月星辰等大千世界的物象失去了吟咏者，倍觉无聊；上天担心“文章”的事业从此断绝，又让人间诞生了贾岛。这首诗中“文章”一词的用例用法极其符合唐人的语境，孟郊、贾岛都是韩愈的友人，孟、贾二人的风格被普遍认为是薪火相接的，这二位专工“诗歌”的诗人，在当时的论述话语中被认为是“文章”事业上的前仆后继者，最典型地反

映了唐人“文章即诗歌”的观念。

以上“文章即诗歌”诸例子都是分析得出的，还有稍为直接的证据。与韩愈同时代的白居易的名文《与元九书》通篇以“歌诗”、“文（章）”互训，典型者如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六七五）“时”“事”、“著”“作”皆同义互训，“文章”、“歌诗”处于相同位置，这是骈偶文的表达习惯使然。二句的意思曰：文章（歌诗）应该为时事而写作。这一例直接证明“文章”“歌诗”二词的同义关系。

当然，“文章”是个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的古老词语，鉴于历代著作文献共时存在的方式，先唐的（甚至“先汉的”）表示其他义项的“文章”概念也仍在传播，唐人作品中不可能清一色都是“文章即诗歌”的例子，浸染古代用法的其他“文章”用例自然也有出现，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：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今人嗤点流传赋，不觉前贤畏后生。”（《钱注杜诗》卷十二）明确论及“赋”，则该例的“文章”义兼诗赋二者。通过联系上下文，类似情形都不难辨别。

语言的运用以约定俗成为法则，唐人当中流行的“文章”、“诗歌”二词混用的做法，个中蹊跷，不一定人人能言。推而广之，又有相关的其他惯例可见。白居易又有一句著名的诗：“制从长庆辞高古，诗到元和体变新。”^⑦“制从长庆辞高古”句白氏原注：“微之长庆初知制诰，文格高古，始变俗体，继者效之也。”“诗到元和体变新”句原注：“众称元、白为千字律诗，或号‘元和格’。”白氏寄诗给他的好朋友、也是文学创新伙伴的元稹，骄傲地历数他们两人的成就：元和年间创造了诗歌新体，长庆年间又改革了制诰的风格。“制——诗”对举的例子，揭示了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一个重要语境因素。

白居易的这两句诗并不涉及本论文的首要关键词“文章”，但是，以“制”与“诗”对举，如上所述，具有二者互相区别的性质。而“制——诗”区别的例子，又可以与上文揭引过的韦述《广陵送别宋员外佐越郑舍人还京》诗“文章——书奏”对举区别的例子一起证明，唐人的观念中，存在着一个与流行的“文章即诗歌”对举的“另一方”：“制”、“书奏”等朝廷制诰公文。韦述诗题中还京的“郑舍人”，以诗句“书奏

北归朝”来看,可能就是赴中书舍人任。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曰:“(中书舍人)掌侍奉进奏,参议表章。凡诏旨勅制,及玺书册命,皆按典故起草进画,既下则署而行之。”在韦诗中,舍人职掌的“书奏”,与诗人写作的“文章”配为对偶。在白诗中,则是以“制”与“诗”(即“文章”)配对。元稹在元和末、长庆初先后任祠部郎中知制诰、中书舍人^⑧。“书奏”、“制”尽管体裁稍异,然而同属朝廷应用的公文。

唐朝的“制”、“书奏”等朝廷公文,大体上也讲骈偶,寻其类属,与唐人文学观念之中的“笔”(双音节词亦作“文笔”)有关。“文章”、“文笔”观念,溯其渊源,又共同关涉到南北朝隋唐文论的“文笔说”、“诗笔说”,而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就是从中衍变出来的。

总之,按诸唐代流行的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,“文章”、“诗歌”为同“一方”,与这“一方”相对应的“另一方”不管其势力、地位如何,也是客观存在的,这“另一方”(如上文“制”、“书奏”之例)当时的共名,以“笔”、“文笔”为常用。从消极方面观察,汉魏以降属文成篇的“文章”这个共名,因为唐人已经习惯性地移用为“诗歌”之另一称呼,“笔”、“文笔”之与“文章”名目之间的联系,几乎式微、淡化到看不清楚的地步,尽管逻辑上“文章”作为“诗歌”、“文笔”二类之共名仍然客观存在、不可能被完全抛弃。

二 从“文笔说”到“诗笔说”

“文笔说”、“诗笔说”,近人有比较充分的研究成果^⑨。所谓“文笔”、“诗笔”说,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将属文成篇的“文章”大概念,分别为“文”与“笔”(或“诗”与“笔”)两个次一级的类别。

中国文学观念史上,以属文成篇、文字著述的案头文本为本位的“文章”概念,建构于两汉之际扬雄、班固的时代^⑩。典型的说法如《汉书·公孙弘等传赞》曰:“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。……刘向、王褒以文章显。”针对这一例子,如果采“以后例前”的方法,可见两组“文章”人才各自似乎分为两个专业领域:司马相如、王褒以辞赋

著名,司马迁、刘向专长在著述;辞赋出于“诗”^⑪,有韵律、讲对偶;而学术著述为散文体。“文章”的两个大类,已经隐藏着将来“文笔说”的端倪。质言其实,“文章”之分为骈、散,又未尝不根源于汉语汉字之分为单音节、双音节的“宿命”。

一般认为明确的“文笔说”开始流行的时代是刘宋初年。笔者认为,同样的将“文章”分为两类,大体上,东汉至西晋时期流行的观念是将“文章”分为“文”与“论”两个大类,似乎着眼点先在“文章”之“用”方面。“文笔说”的流行乃继“文”“论”分类而起。东晋百年是个过渡期,也是新兴的“文笔说”的酝酿期^⑫。

东晋南朝的“文笔说”本身又有两个发展阶段,因而可以分别称为“旧文笔说”、“新文笔说”,“诗笔说”的起来则因缘于“新文笔说”。“文笔说”(“旧文笔说”)有广为人知的定义,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篇曰:“今之常言,有文有笔,以为无韵者笔也,有韵者文也。”按:经过“文”“论”分类与目录学“四部”分类法的处理,到晋宋时代,从前汉魏时代算在“文章”名目之下的属于子部、史部的大部分著述,已经不属于集部“文章”的范围,属文成篇的“文章”名目的适用范围已经大为收窄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一般所谓“文章”之中,“无韵者笔”已经基本无法与“有韵者文”有效抗衡。以骈偶、押韵、藻饰为特色的骈体文渐成“文章”世界压倒性的主流与规范。这一点,又可参看梁萧统《文选序》阐释的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的纲领,经、子、史书均被排斥在《文选》选文的范围之外,以属文成篇、文字著述为本位来看,“无韵者笔”的主力部分(按:经子史书多散文质语)已经自动地不属于“文章”范围。总之,在骈体成为主流的文学史新形势之下,以有韵、无韵为着眼点的“旧文笔说”分类方法适用的有限性、有效性又引出了“新文笔说”的挑战。

既然“文章”大体上已成“有韵者文”的天下,那么,在“有韵者文”之“文章”范围之内,自然又有一个新的分类的需求。“新文笔说”见萧统的弟弟、梁元帝萧绎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,曰:

古人之学者有二,今人之学者有四。夫子门徒,转相师受,通圣人之经者,谓之儒;

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长卿之徒止于辞赋，则谓之文。今之儒，博穷子史，但能识其事，不能通其理者，谓之学；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，善为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泛谓之笔。吟咏风谣、流连哀思者，谓之文。……笔，退则非谓成篇，进则不云取义，神其巧惠，笔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维须绮縠纷披，宫征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。而古之文笔、今之文笔，其源又异。

照萧绎的意思，古之学者分为“儒”、“文”二类，今之学者，儒复分为“儒”与“学”，文复分为“文”与“笔”，则共计四类：儒、学、文、笔。而他的分类，对“学”、对“笔”分别都有毫无掩饰的鄙视之义，分别视同“儒”、“文”的末流。与文学观念史相关的，这段论述的核心是对“文笔说”的新阐释。对于“文笔”区别，萧绎的解释没有先提韵不韵的问题，他先定义“笔”：“不便为诗……善为章奏……若此之流，泛谓之笔。”又曰：“笔，退则非谓成篇，进则不云取义，神其巧惠，笔端而已。”一副不屑的架势。而对于“文”，则充满热情：“吟咏风谣、流连哀思者，谓之文。”又曰：“文者，维须绮縠纷披，宫征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。”归纳之，“绮縠纷披”指藻采，“宫征靡曼，唇吻遒会”指调谐可歌，“情灵摇荡”、“吟咏风谣、流连哀思者”指情思感人，所谓“文”，表达了完整的“新文章”的观念。对于“笔”，则“不便为诗”，“善为章奏”，“退则非谓成篇，进则不云取义，神其巧惠，笔端而已”，基本上就是“文”的等而下之之义。萧绎的理论中，“诗”字也值得注意，一则，他所论的“文”，“吟咏风谣”云云，“情灵摇荡”云云，都是以诗为典型的；二则，他论“笔”，曰“不便为诗”^③。总之，在“永明体”、“宫体”文学新思潮此起彼伏的时代，萧绎阐释的“新文笔说”与时俱进，致力维护以诗歌为体类中心的唯美的文学价值观，对于传统的“旧文笔说”是个创新与突破。这一“新文笔说”强化了“诗”在“文章”世界的核心地位，“诗笔说”已经呼之欲出。

通常附论于南朝“文笔说”之下的“诗笔说”，相关典型例证，如梁代文豪任昉故事。钟嵘《诗品》中品评任昉曰：“彦昇（按：任昉字）少

年为诗不工，故世称‘沈诗任笔’，昉深恨之。晚节爱好既笃，文亦遒变。……故擢居中品。”任昉早年工于文笔，诗不行，与沈约齐名，称为“沈诗任笔”；任昉以不工诗为耻，晚年全力作诗，取得了一定成就。又如梁简文帝萧纲《与湘东王书》，一则曰：“比见京师文体，……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”再则曰：“近世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昉、陆倕之笔，斯实文章之冠冕，述作之楷模。”^④上述诸例，都以诗、笔二分并兼括“文章”文学成就，足证齐梁时代盛行“诗笔说”^⑤。“文章”分为“诗”与“笔”，而“诗”、“笔”二者也非一般并列复合关系，“诗”实“文章”之英华、精粹、核心之所在。

综上所述，与“文论说”（分文章为文、论二类）、“旧文笔说”（分文章为文、笔二类）分类的结果最终皆由“文”的一方拥有“文章”大名的演变方式一致，“新文笔说”（“诗笔说”）流行的时代，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产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对于“笔”（“文笔”）的范围，传统的“文笔说”以“无韵者笔”为标准，包括叙事、议论及应用文体的散文在内；而南朝后期的“新文笔说”以“不便为诗……善为章奏……神其巧惠，笔端而已”为“笔”，直斥的主要是诸实用文体；在骈偶文主导的文学时代，实用文体多数也有韵对方面的讲究。所以，“笔”的概念至少也有新旧两代。而语言的世界宛如一个“古老的城市”，各代的建筑在其中共处。明乎此，就容易理解唐人所谓“笔”（“文笔”）语义的多样性。比如本文第一节所揭的、与“文章”（或“诗”）对照的“书奏”、“制”等，唐时一般也是讲究韵对的骈体文，按“新文笔说”仍属于“笔”；而下文将要论及的韩愈著名的“韩笔”之“笔”，则多数是纯然古体的散文，更属于传统“文笔说”所界定的“笔”的范围。

三 唐代“诗笔说”之流行

“诗笔说”的流行是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前提条件，“文章”分为诗、笔二类，“诗”为“文章”之精华与核心，遂习惯性地冒用“文章”大名。唐代诗、笔并称的“诗笔说”的例子，如杜甫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、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

十韵》诗曰：“贾笔论孤愤，严诗赋几篇。”（《钱注杜诗》卷十）这是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引述过的。诗作于乾元二年（759），贾至、严武是杜甫的两位好友，贾笔严诗，注杜者曰不必过泥，也有互文谐律的可能，因为贾至也能作诗^⑩。但是，诗、笔并举的习惯却是可以由此证明的。

贞元、元和、长庆之际的诗人元稹《代曲江老人百韵》拟“曲江老人”口吻追忆开元、天宝盛世，涉及文学的诗句：“李杜诗篇敌，苏张笔力匀。乐章轻鲍照，碑板笑颜竣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四〇五）。“苏张”，开元时期朝廷大手笔苏颋、张说^⑪。“鲍照”，南朝刘宋著名诗人；“颜竣”以文笔著名，亦刘宋人。四句之中，“李杜”二句纪实，“乐章”二句用典。诗句大意：诗篇乐章李白、杜甫齐名，文笔碑板苏颋、张说齐名，相比之下，历史上著名的鲍照“诗”的成就、颜竣“笔”的成就都是那么不足道。极力渲染开元时代文章文学之盛。诗题下注：“年十六时作。”则诗作于贞元十年（794），元稹妙年居长安之时，特别爱读杜甫诗^⑫。此例证明贞元年中，文学青年眼中的文章就是分为“诗篇”“乐章”，与“（文）笔”“碑板”两大类的。“诗歌”之于“文笔”，楚河汉界，泾渭分明。

晚唐诗人杜牧又有诗句：“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”尽管传世各本《樊川集》“韩笔”作“韩集”，唯宋人编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则作“韩笔”。“观宋人每特论及此，知当时所见多是‘笔’字。”^⑬杜牧的原文应该就是“杜诗韩笔”并举的。“诗”、“笔”并举的典型例子，又有清大儒阮元以下论“文笔说”者常引用的晚唐赵璘《因话录》曰：“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，韩公文至高，孟长于五言，时号‘孟诗韩笔’。”杜牧、赵璘都是与韩愈时代相接的人物，他们的话，足以证明“韩笔”在当时的名声，以及诗、笔分庭抗礼的“诗笔说”文章观念在唐代的流行。

李肇《唐国史补》云：“元和以后，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，学苦涩于樊宗师。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。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，学浅切于白居易，学淫靡于元稹。”^⑭李肇活跃于元和、长庆间。这是当时人对元和后文坛风气的一段著名的概括。其中“文笔”、“歌行”、“诗章”对举。所谓“文笔”，“文”字是配合“笔”而成的一个双音节词

而已，“笔”若易以双音节词，即名“文笔”。“歌行”、“诗章”云云，涉及到当时诗歌内部的分类，此不赘。大体也是以诗、笔二端总结文人成就。

综上亦可见，在唐人的论文语境中，文学史上诗歌强势、诗风昌盛的时代，并不存在有实力与“诗歌”并驾齐驱的“文章”概念（如后人熟悉的“诗文”之例）。“诗歌”占“文章”首座，“非诗”的作品位居“陪席”，唐人习惯性地用“文章”指称“诗歌”，“文章”“诗歌”二概念的复合性关系如此。“诗笔说”流行、“文章即诗歌”，“文笔”（单音节作“笔”）只能视为“文章即诗歌”的附庸。端倪实在南朝，唐人相沿成习。这是文学史的“细节”，也是文学史的“本质”。

四 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与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之颠覆

现代人习惯所称的唐宋“古文运动”，从本文的论题看，宛如文学史上一场持续三百年的“大战”。“文章”的世界里，长期被贬为“笔”（“文笔”）的“古文”起而与长期受尊宠的诗歌争夺“文章”“冠名权”（也可以称为争夺“文章首席”）的战争，实质上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学价值观的较量。

在两汉“文章司马迁、相如。……刘向、王褒以文章显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等传赞》）的时代，从事叙事、议论的史传、子论都是“文章”世界理所当然的成员，都可以称为“文章”。可惜，从“文章即诗歌”的唐代回望历史，这已经是个多么不可企及的“古代的荣耀”了。随着“文”、“论”瓜分“文章”的天下，以及“文笔说”、“新文笔说”（“诗笔说”）陆续整理文学山河，叙事、议论的散文，被驱离“文章”文学的中心越来越远。这一类“文章”，与正宗的“文章”（诗歌）相对待；一般只能称为“杂文”或“笔”，唐人也有称为“古文章”^⑮的，受尽冷落之苦。

文学复古的先行者，唐人多推陈子昂、卢藏用等人代表。其实，第一波有规模的“高潮”，要以开元、天宝间萧颖士、李华等人的活动声势更为壮大，数十年间，薪火相传不断，直至韩愈、柳宗元的时代达到一个巅峰^⑯。萧颖士，天宝时期有“萧夫子”之誉，他的学术以《春秋》史学为

根基,兼重叙事与褒贬,《江有归舟》诗序曰:“文也者,非云尚形似,牵比类,以局夫俚偶,放于奇靡。其于言也,必浅而乖矣。所务乎激扬雅训,彰宣事实而已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154)显然,他反对讲究声律俚偶、形似用事的当时的“今体文”,而他所致力“激扬雅训,彰宣事实”之文正是所谓“古体文”。从历史认同的角度,萧颖士有直接否决魏晋以下之论,《赠韦司业书》曰:“平生属文,格不近俗……魏晋以来,未尝留意。”^②不留意魏晋以下,也表明兴趣在两汉以上。李华是萧颖士的文学挚友,强调文学的教化价值,反对文学的形式唯美,是二人志业所同。按独孤及的推崇,贾至大致拥有天宝复古第三人的地位,其论文志在教化斯民、斫雕为朴。

得李华提携的独孤及是历时期成为一代文宗。复古运动的共同诉求,宗奉儒家经典、贬抑《楚辞》以下的文学传统,独孤及也是坚持的。他理论的创新点是明确将努力方向指向追崇贾谊、司马迁、班固代表的两汉文体。“天下凜然,复睹两汉之遗风。”^③后来明朝人“文必秦汉”的复古口号,或渊源于此。独孤及的学生梁肃是韩愈的师辈,梁肃的复古理论更加系统化,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味。《补阙李君前集序》曰:“故文本於道,失道则博之以气,气不足则饰之以辞,盖道能兼气,气能兼辞,辞不当则文斯败矣。”^④梁肃从道、气、词(辞)三者递降的关系论文学,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出发的。一举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在观念中完全建构起来。在这一“关系网”中,“道”是世界的本原,儒家“名教”从事解释“道”,所以,经子史书中记载王迹、宣扬教化的文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。“气”作为人的本性与气质的来源,对文学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意义。按照这一理论,“文章即诗歌”传统中那种以声律骈偶为基础的专工文词的文学是比较没有出息的。将来韩愈倡导的“气盛言宜”、宋代开始流行的“文以载道”诸观念,都可以从梁肃阐释的理论得其端倪。

韩愈、柳宗元的时代,“古文”取得了唐代巅峰性的成就,但是,如本论文揭引的若干例所显示的那样,“文章即诗歌”的观念、话语习惯并未受到触动。韩愈一方面随俗将“诗歌”称为“文章”,另一方面,他自己致力的“古文”也包括在“文章”里^⑤,按之一般逻辑与唐人用语习惯,都

没有大问题。但是,当时受众更习惯按诗、笔分类的观念,将韩愈式作品称之为“笔”(文笔)^⑥或“古文章”(即“古文”)^⑦,因此,韩愈在当代文学中的突出成就,才被叫作“韩笔”;称之为“古文”也名副其实。按唐时的标准,“韩笔”属于“杂文”,两汉的文体看在唐人眼里,恐怕都是“杂文”或“笔”。韩愈的学生、子婿李汉为韩愈编遗集《昌黎先生集》,首冠诗赋,其下即以“杂著”标目,收入韩愈偏爱的体裁名目各异的“古文”,包括《原道》、《师说》等名文在内。这些称名、归类的习俗,即使起韩愈而问之,他热衷的“古文”,恐怕也理所当然地归属为“杂文”、“笔”,唐时“文章”有其正宗,“文章即诗歌”是既定的文学观念。

对于韩愈时代热衷“古文”的文人群体所挑战的内容,李翱《答朱载言书》有一段具体说明:“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:其尚异者则曰,文章辞句奇险而已;其好理者则曰,文章叙意苟通而已;其溺于时者则曰,文章必当对;其病于时者则曰,文章不当对;其爱难者则曰,文章宜深不当易;其爱易者则曰,文章宜通不当难。”^⑧唐代流行的“文章”标准是佳对逸韵,对偶、有韵、藻饰,不用对偶不能称为“文章”。《文镜秘府论》北卷《论对属》曰:“凡为文章,皆须对属;诚以事不孤立,必有配匹而成。……若以不对为常,则非复文章。”注曰:“若常不对,则与俗之言无异。”而“古文运动”实质上就是“以不对为常”的散文(“古文”)的抗争运动,“当时文体之争,一在平奇,一在奇偶,一在浅深。此则韩、柳之作异于当时者也。”^⑨笼统来看,古文、时文争论的焦点就在“声律对偶”。

至北宋时期,以欧阳修、苏轼等为代表,韩愈跨时代的继承者前仆后继,终将夹叙夹议、散体的“古文”建设成为“文章”第一大宗。僻处“文章”世界之“一隅”的唐代的“韩笔”,被苏轼讴歌为“‘文’起八代之衰”^⑩,是最庄严的“文章”典范。在此新的文学时代、新的文学观念与话语中,哪里还有“文章即诗歌”的位置^⑪?

“古文”占据“文章”首席,“诗歌”回归本位,相应的,“笔”(“文笔”)的概念也几乎消失。南宋前期著名诗人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以颇为稀罕的口气讨论过他称为“南朝语”的“笔”

的问题。曰：

南朝词人谓文为笔，故《沈约传》云：“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昇工于笔，约兼而有之。”又《庾肩吾传》，梁简文《与湘东王书》论文章之弊，曰：“诗既如此，笔又如之。”又曰：“谢朓、沈约之诗，陆倕、任昉之笔。”《任昉传》又有“沈诗任笔”之语。老杜《寄贾至严武诗》云：“贾笔论孤愤，严诗赋几篇。”杜牧之亦云：“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”亦袭南朝语尔。^⑤

陆游引证说南朝人称宋人所说的“文”为“笔”，又引证曰唐人“袭南朝语”，正好表明南朝人、唐人互相之间能够共享话语，而为宋人所隔膜与不理解。“南朝语”为唐人所沿袭，证明南朝、隋唐的文学观念、文学话语是能够兼容的。

宋人深感隔膜的话语，宋代以下更是日甚一日，甚至闹出笑话。明末张溥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，各为作“题辞”。其《何记室（逊）集》题辞曰：“何仲言文名齐刘孝绰，诗名齐阴子坚（按：阴铿），今集中文颇少”^⑥云云。按：张溥的意思是何逊的文学成就分为“文”（文章）与“诗”两方面，“文章”与刘孝绰齐名、诗歌与阴铿齐名。众所周知，张氏所谓“诗名齐阴子坚”依据的是杜甫著名诗句“颇学阴何苦用心”之“阴何”^⑦。而张氏题辞所谓“文名齐刘孝绰”依据的则是《梁书·文学·何逊传》，曰：“（何）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，世谓之‘何刘’。”明人张溥望文生义，已经读不懂《梁书》，从而犯下常识性错误。殊不知在何逊生活的梁代，或姚察撰《梁书》的陈、隋之代，“文章即诗歌”的观念流行，所谓“何（逊）刘（孝绰）”“文章”齐名，指的就是何、刘二人“诗歌”成就方面的不相上下而言的。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篇记载：“何逊诗实为清巧，……刘（孝绰）甚忌之，……撰《诗苑》，止取何两篇，时人讥其不广。”刘孝绰忌何逊之诗，正说明此问题。张溥竟以为“何刘”齐名的是“古文”之“文章”。

由于文笔、诗笔区分的观念早已不复流行，相应的，提到“笔”、“文笔”诸概念，明清人一般也是不知所云的。明清之际诗论家冯班曰：“南北朝以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。……今人不知古称‘笔’语是何物矣。”^⑧彻底的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与陆游、冯班等的消极论述比较，围绕“文章”、“文笔”诸问题的隔膜，清阮元在相关问题上的论述态度最为积极，影响也最大。清代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“文言说”、“文笔说”之提出，阮元的基本观点是，有韵之文（具体而言，在他的时代就是与“古文”对立的骈体文）本来就是中国文章的正宗。在宗经的传统话语环境之中，阮元的论述引证经典，以《周易·文言》为“文”、“文章”之鼻祖，而力斥宋明以下占据主导地位之“古文”为“笔”，又对中古文学史上“文笔说”备加引述。阮元的观点具有致用、求是两个方面的用意。在阮元活跃的清代中期，“古文”系列的最后一座重镇“桐城派”势力非常活跃，而清代得到复兴的骈文写作也方兴未艾，二者之间爆发了争夺文坛主导权的竞争，阮元代表的文学派别，文学史上有称为“仪征派”的^⑨。撇开清中期文坛的实际地位之争，阮元对中古文学史上文、笔之分的辨析，反映了历史上的实际情况，而鉴于阮元仕宦、学术上地位之尊崇，他的相关论述影响自然特别大。继承阮元相关论述而发扬光大之代表人物，可推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。刘师培的时代，古文、骈文的坛坫之争尚有流风余沫^⑩，但是，他在《左庵集》、《中古文学史》等著作中对阮元论述的推广与补充，总的来说属于“求是”性质的。

但是，阮氏、刘氏以及近现代后续学者有关“文言”、“文笔”诸问题的辩证，多以六朝为关注重心，唐人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隐微之处尚未被直接、充分地揭发。笔者研习唐代文学有年，故发挥前贤余绪，作为此论。

总之，现在脱离了“古文”、骈文正闰之分相较量的文坛环境，更有利于作出平情客观的总结。按照两汉时代属文成篇、文字著述为本位的“文章”概念，从事叙事议论的史论类散文体“古文”与从事吟咏歌颂的韵文体“诗赋”是“文章”大家庭的两个主要成员。随着辞赋文明引导的文学史的进程，后汉魏西晋时代的“文章”概念经历了“文”、“论”分化，逐渐倾向排偶化。东晋南朝“文笔说”的持续流行，更将“美文”塑造为“文章”的典范，“文章即诗歌”的观念在隋唐五代时期相沿成习。魏晋以下时代的“文章”文学观念中，“古文”长期受贬抑，沦为日趋骈俪化的今“文章”的陪衬者“文笔”。“古文运动”起而

抗争,成功争取到“古文”(古文章)在“文章”世界的更高地位、更大影响。但是,“古文”专用“文章”之名,是北宋之前史无前例的新局。

观察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文学史意义,其所反映、所坚持的“美文优越、诗歌至上”的自觉的审美意识,未尝不可视为唐诗繁荣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。当然,唐宋接力的“古文运动”开辟了文学史的新天地,那自然另当别论。

①钱仲联: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,第989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。

②马茂元:《晚照楼论文集》,第11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③参见陶敏《沈佺期宋之问简谱》,《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》,附录,中华书局2001年版。

④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·序》,《陈子昂集》卷一。

⑤这一观点,后经韩愈的发挥,成为“诗穷而后工”的理论。

⑥钱仲联: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,第1288—1289页。

⑦《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》,《全唐诗》卷四四六。

⑧参见卞孝萱《元稹年谱》,齐鲁书社1980年版。按:唐朝廷以他官掌诏敕,谓之“知制诰”。

⑨经典奠基的论述,见刘师培《中古文学史》第五课《宋齐梁陈文学概略》丁《总论》的《文笔之区别》节。推而广之的名论,有逯钦立《说文笔》,载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王运熙、杨明《中国文学批评史(魏晋南北朝卷)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)第二编第一、第二章,也有比较充分的论述。

⑩参见拙文《著述之风与两汉时期文本位“文章”新概念的建构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》(2009年卷)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

⑪班固《两都赋·序》曰:“赋者,古诗之流也。”《文选》卷一。

⑫参见拙文《“文”与“论”:著述“文章”新概念的一次分化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》(2011年卷)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。

⑬逯钦立解释,认为“梁元帝把阁纂的诗,也归到笔里去”(同前逯文,366页)。按:可能是误解,按骈体文的读法,“不便为诗”、“善为章奏”大意或是互文,表示“文章”不具有诗美、仅擅章奏的,称为“笔”。

⑭《梁书·文学·庾肩吾传》。

⑮王运熙曰:“五言诗在南朝盛行,是有韵之文中最受人喜爱和重视的一种样式,因此当时又有诗笔这一名称。”前揭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(魏晋南北朝卷)》,第162页。

⑯浦起龙:《读杜心解》,第725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。

⑰张说封燕国公,与许国公苏颋文笔齐名,称“燕许大手笔”。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五《苏颋传》曰:“自景龙后,(苏颋)与张说以文章显,称望略等,故时号‘燕许大手笔’。帝爱其文,曰:‘卿所为诏令,别录副本,署臣某撰,朕当留中。’后遂为故事。”

⑱参见卞孝萱《元稹年谱》,第33—34页,齐鲁书社1980年版。

⑲(清)冯集梧:《樊川诗集注》,第14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⑳《国史补》,第5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。

㉑张籍《祭退之》诗曰:“呜呼吏部公,其道诚巍昂。……独得雄直气,发为古文章。”《全唐诗》,卷三八三。

㉒拙著《八世纪诗风——探索唐诗史上“沈宋的世纪(705—805)”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,2013年版,第二章第四节第三小节、第四小节、第三章第四节、第六章第三节第三小节对于唐中期“古文运动”复古思潮有比较系统的梳理。

㉓《全唐文》卷三二三。

㉔梁肃:《毗陵集后序》,《全唐文》卷五一八。

㉕《全唐文》卷四八〇。

㉖《进学解》曰:“作为文章,其书满家。”《昌黎文集》卷一二。

㉗刘禹锡:《祭韩吏部文》:“子长在笔,予长在论。”《刘宾客文集》外集卷十。

㉘前揭张籍《祭退之》诗。

㉙《全唐文》卷六三五。

㉚刘师培:《中国中古文学史·论文杂记》,第120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

㉛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,《东坡全集》卷八六。

㉜按:几代宋人百年间前赴后继颠覆“文章即诗歌”观念的历程,兹事体大,容笔者另作专论。

㉝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九,第59页,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《陆放翁全集》本。按:所引各传皆出《南史》。

㉞殷孟伦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》,第254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㉟《解闷十二首》其七,《钱注杜诗》卷一五。

㊱冯班:《钝吟杂录》卷三《正俗》,《常熟二冯先生集》本。

㊲阮元籍隶扬州仪征。

㊳“新文化运动”起来之后,它的骨干人物钱玄同痛斥“桐城谬种,《选》学妖孽”,发出的是欲取二者而代之的第三势力的声音。

[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]

责任编辑:李超